

文/哲学系 倪梁康

●……这表明思想或心智是在语言之中，但同时也在语言之上。

断断续续读了两三个月，终于将村上春树的《1Q84》读完。先是在广州买了前两卷施小炜翻译的横排简体版，第三卷则是在台北购得的赖明珠译的竖排繁体版。译者不同，但风格感觉还是一致的，可以流畅无碍地连续读下去。这似乎印证了萨弗兰斯基的一句话：译者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此话乍听起来有些刺耳，尤其是对翻译家。可是细想一下却不无道理。《圣经》不会因为译得不好就无法传播，选择哪一个译本并不是首要的问题。本雅明赋予译者的责任并不很大。因此有人认为他的“译者的任务(Aufgabe)”的文章更应译作“译者的放弃”。的确，翻译家有可能成为大学者或大语言学家，却永远不会因为翻译而成为大思想家。这表明思想或心智是在语言之中，但同时也在语言之上。正是有了这种意与言之间的若即若离，我们才不会过于迷信语言，才不会太多地执着于辞章，才不会成为语言主义者。

村上春树的这部小说，风格是一个各种小说式样的综合体。用爱情、神秘、哲理、宗教、犯罪、推理……等等中的任何一个来定义它都会是不足或扭曲，而且有可能越说越远，但即便将它们加在一起，也仍然不可能反映出它的总体格调。如果必须用一个词来表达它，我会选择玄幻。

天吾与深绘里的一个问答十分经典，也十分切题：

天吾脱口而出，问了很久以来一直想问的问题：“告诉我，《空气蛹》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故事？”“真实又是什么意思。”深绘里不带问号地问。

它显然不是传统小说，但也难以将它界定为某种意义上的后现代小说。它是有故事的，以至于读者会为了情节而急于看下去，会因为故事而觉得其余陈述的拖沓，放弃了作者安排和设计的张驰节奏，会由于过于期待玄妙的结局而最终收获失望。事实上，在故事情节的背后，常常闪烁着许多敏锐的感受、深邃的哲思、机智的比喻、或写实或写意的细致描述……，一味地紧跟在故事后面颠簸，就会错过许多风景，而且是在别处见不到的风景。阅读的速度是一个要点。听说这本书的中译本印了上百万。我想如果卖得不好，那么原因很可能是大多数读者读得过慢，失去了耐心；或者因为大多数读得过快，从而最终只是得到了满足其好奇心的结果。

之所以说它是玄幻小说，是因为它叙说的不是 1984 而是 1Q84。处在 1Q84 的特征是这个世界有两个月亮。看见这个景象的便处在 1Q84，否则就处在 1984。因此，这两个世界，并不一定意味着两个地域，惟有女主角青豆是个例外；她从首卷的第一章就明确地在物理上进入 1Q84 玄幻世界，直到末卷的最后一章才退出。男主人公天吾则因为涉及对虚幻小说《空气蛹》的改写，心理上不断地在两个世界之间转换，“但一旦闭上眼睛，对自己究竟是置身于哪个世界，天吾便没有了自信。”可以确定的是，直到最后一章，他才随青豆一起从物理上从玄幻世界中脱身。另一个悲剧角色牛河则不知从何时开始闯入玄幻世界，并且无奈地从心理物理上被处死在那里。

1Q84 与 1984 只有一字之差，作者暗示两个世界的区别并不很大。但它们之间区别也不很小，足以构成玄幻与现实的分界。

虽然与村上春树以往的作品相比，这部巨著并不意味着相对于他以往著作的特别跨越，甚至我不认为这是他至此为止的最好著作，我仍然愿意用书中的一句话来评价这本书：

那确实是会迷惑人心的光景。

忆戴镏龄教授

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对方折服。●这其实是中港两地文学翻译权威的交手，戴老渊

文/关庆宁

“你是戴镏龄教授的学生吗？”如果有人这样问，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我在校时，他是外语系主任，我的毕业证书上赫然写着“戴镏龄”三个大字，这师生关系是如假包换的。然而，回答后又难免有几分心虚。因为在中大的四年中，我并没有听过他的课。

直到一九八二年毕业，到广东省教育厅工作后，我才有机会直接聆听戴老的教诲。当时教育厅位于广卫路，八四年夏，14 路车总站因修路工程暂时移到省教育厅大门外。我好几次见到戴先生在等车，便上前打招呼，他听说我是外语系毕业生，很高兴。临时车站是露天的，我便请他进办公楼休息，以免遭日晒雨淋，通常会陪他聊聊天。

有一次，当他获悉我正在翻译电视剧时，便表示，他年青时也翻译过剧本，戏剧台词句子结构较简单，要译好却不易，因为不但要求信达雅，更需传神。好一个“传神”，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后来工程完工，车站回迁，我就再没见到他了，直到九十年代初回香港定居后，才再度与他联系。也正是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了解戴老的学识人品。

我回港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联书店任英文编辑。入职首日，就有同事告诉我：你坐的是一个福位，我只当是开玩笑，但干了一段时间后，就领悟个中奥秘了。三联是一间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质量都很高，对英文编辑的中英文能力要求也较高。但由于是左派机构，出不起较高薪酬，往往留不住人才。以前几位英文编辑都是干一两年就被挖走，而且都混得不错。

大约三个月后，我就面对考验了，当时约了一本书稿——《陶渊明诗文英译》，作者是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谭时霖教授。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把能搜集到的陶渊明作品都翻译成英文，结集出版，还请了暨大曾昭科教授作序。对我来说，处理这样的书稿并非轻松之事，所以不敢怠慢，开了几晚夜车，把中英文诗稿一一对照，最后总算顺利付印。

书出版后，也许因为曲高和寡吧，不算畅销，但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国内和英美一些图书馆和高等院校都订购了，总算有所交代了。

岂料数星期后，老总忽然急召我，她拿出一封读者来信，要我尽快答复。我开头觉得很奇怪，出版社收读者来信本属家常便饭，为何如此郑重其事？但当我看到来信人的名字时，就恍然大悟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在港英体制中地位崇高。

来信高度评价《陶》书，赞扬作者做了有意义的工作，填补了空白，为推广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翻译水平也很高，接着笔锋一转，对某些诗句的译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香港回归前，港英当局对左派机构深存戒心，高官们更是避之则吉。现在这么一个大人物亲笔致信，三联的高层似乎有点受宠若惊。老总千叮万嘱要我务必认真答复。

港英高官大多数都英文强中文弱，若是其它人，我完全可以应付过去，但对这位人士绝不能有半点怠慢，他以学贯中西著称，据说正在从事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英译，乃此道高手。

我急忙致电谭时霖先生，却老打不通，原来出国探亲了，只好找曾昭科先生，但也是白找，因为他当了省人大副主任，忙得不亦乐乎。失望之余，忽然想起谭先生曾在序言提过“承蒙戴镏龄教授审阅部分书稿”，于是便致信戴老求援。我把读者来信转寄给他，说谭先生不在国内，问他能否拨冗解惑。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点病急乱投医，忙乱中竟忘了表明我是他的学生，只把自己的名片塞进信封。因为不知他的详细地址，信寄到中大外语系办公室。

一个星期过去了，仍不见回音，心想戴老可能太忙，无暇回信，更担心信寄失了。就在心急火燎之际，同事送来一个厚厚的信封，打开一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是戴先生的复信，长达十页，中文字用钢笔写，很工整，英文句子则用打字机打出。信中对那位读者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他引用了大量资料，探讨陶氏作诗文时的意境和心境，以证明谭先生译笔传神。信很有说服力，却不会予人咄咄逼人之感。

我收到信后，迅速向老总报告，并即日转寄给那位高官，对方很快复信，表示满意戴老的解释，不再坚持己见。戴先生的来信，本身就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可惜后来弄丢了，否则完全可以收进《戴镏龄文集》。

这其实是中港两地文学翻译权威的交手，戴老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令对方折服。说实话，经历这一事件后，我才真正为自己作为中大外语系毕业生而自豪。今年是戴镏龄教授百岁冥寿，我把此事记录下来，作为对老师的纪念。

（本文作者为外语系 82 届校友）

自然之感悟

失落●我来过，经历过，便是最高的造化。回味科学历程中的万般甘苦，无须嗟叹

文/孙逸仙纪念医院 宋尔卫

研究科学时，我竭力捕捉瞬间闪烁的思维火花；治疗患者时，我认真洞察病情的细微变化。多年临床和实验的历练，养成了我果敢决断而又精准谨慎的性格。

然而也有例外的时候。当踏上旅途，“我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只有走进大自然，才最能顿悟“念念无住，在在无心”的自由与潇洒。多少古人云游名山大川，寓情于景，即景生情，或“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怀古伤今，或“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欣喜若狂，大自然便成了他们寄托情怀的寓所，也因此留下无数传诵千古的名句。

在旅途中，我时刻都在感受造物的神奇——深壑的陡壁，绵亘的山峦；湍飞的鸣涧，古朴的苍松；葱郁的春草，绚丽的秋叶；皑皑的雪峰，粼粼的湖光……这一切都迥然各异，这一切又浑然天成。我无法留住置身旅途的时光，惟有借助相机的瞳孔，记录下我在那一瞬间的眷恋。无论是黄石公园的变幻莫测，还是九寨黄龙的意蕴无穷，每一个取景的角度，都是我对自然的诠释，每一帧照片的色彩，都融入了我的呼吸。谁说流水落花无情？悠悠岁月，空谷足音，我来过，感叹过，欢欣过，涤荡过，于此足矣。

摄影，是人生的领悟。看夕阳依山而尽，看雪花漫天飞舞，看鱼儿翔游湖底，看黄叶萧萧飘落，回味科学历程中的万般甘苦，无须嗟叹失落，我来过，经历过，便是最高的造化。感恩在我生命中出现的一切美好，也感恩一切的不圆满、不如意让我的心智日臻成熟。

我研究生命现象，每天和学生一起辛勤耕耘，面对杂乱矛盾的实验数据，有的与我们的假设矛盾，有的与别人的数据矛盾，有的与约定俗成的公理矛盾。我和我的学生们，都曾困惑过，消沉过，也有扼腕顿足甚至万念皆灰的时候。此时需要沉静的反思与内心的平和，更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撑。就像造物者给自然界设下的种种矛盾，譬如让严寒抹煞大地的生机。但是，“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最终大自然总是能到达和谐，无论怎样复杂矛盾的科学现象，终究会展现统一的规律，这也正是科学研究无穷的魅力。

踏在科学的旅途上，是做匆匆过客一无所获，还是处处留心满载而归？我相信，内心通透天地便宽阔。我相信，内心祥和百鸟才会随你欢唱。我感谢所有在科研路上的同行者，谨以此粗拙之作，与之分享我对大自然的印象和感悟。

拥有一颗年轻的心

●我对未来之路总是心地单纯地充满好奇，总是满怀激情地欣然前往。

文/管理学院 梁 琦

在学术上我得到过一些荣誉，譬如前不久，《国际结算》入选第一批“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但学术圈是个男人圈，中山大学的女同胞们给了我一个“巾帼标兵”的荣誉，我感到这是中大姐妹们给我的深情厚谊，很开心。而我最想和大家分享的生活感悟是：让我们拥有一颗年轻的心。

年轻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向往，随着岁月的流失，年轻的容颜会不断老去，但年轻的心态可以亘古不变。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年轻的心，生命即使长度有限，也会增加宽度和高度，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加充实和饱满，生活就会更加阳光和温馨。

我认为，只要你对新事物充满热情和单纯的向往，你就会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我常常羡慕歌唱家、舞蹈家、画家，甚至园艺家们等，他们给人类创造出美丽；我非常尊敬医生尊重医学，他们给人类带来健康。有时候我会遐想，如果当年高考报了其它的志愿，今天的我会从事什么职业，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美？

也许世上的路有无数条，没有哪一条一定是最好的。我对未来之路总是心地单纯地充满好奇，总是满怀激情地欣然前往，不去瞻前顾后地考虑眼前利益，不会去考虑转移成本。在学术人生中，任何一个吸引我走其它道路的契机，都会化作我前行的动力，从基础数学到应用数学，从管理学到经济学，我的职业生涯中换过几次专业。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原理：你每做一个新的决策，不要去考虑沉没成本，要向前看。于我而言，每一次换专业，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又有机会学新东西了”。

起初我在南京大学工商管理系任教。有天晚上接到领导电话，当时南京大学教授《国际结算》的老师突然调离，急需找人顶上，领导“哄”我说“梁琦，你是我们商学院的大才女，学新东西最快，你来国际经济贸易系吧”，那时我对“国际结算”这个词还是第一次听说。正因为一无所知，反倒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加上领导一晚三个电话，于是我就答应下来。就这样从工商管理系换到了国际经济贸易系，从运筹学、统计学换到了国际贸易学。

当时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年整个南大的 MBA 教育是由工商管理系独家主办，想一想，这个系老师的收入是其它系的多少倍？五倍？八倍？更何况我是中国商学教育最早的一批运筹学师资(过去只有数学系有运筹学)，有了十余年教学经验，继续走下去是轻车熟路，所以在别人眼里，此时转系转专业于名于利都是赔本而且是大赔本。并且我年龄不小了，一位女同事劝我说：“女人 40 不学艺，你还真的从头去学？”可是，当时我只是单纯地想：“读书人反正是读书，读啥不是读？”

之后，我将当时改革开放十余年来国内所有能找到的国际结算文献查了个遍，正式出版的书不多，相关刊物也比较少，《国际商报》上却经常有最现实最经典的企业案例。于是我每天一张张报纸地去查，读了累计整整十年的《国际商报》。图书馆的旧报纸满是灰尘，我不得不借一件长工作服，戴上大口罩，在阴暗的旧书报库里一呆就是三四个小时，实在受不了就出去透一下气，旧书报库那个霉气味是很难受的。

有一天，楼下邻居南大哲学系的主任见到我很惊讶：“我们楼上楼下的，却大半年没见到过你，还以为你出国了呢。”这本如今在国内 200 多所大学普遍使用、连续被评为“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的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国际结算》的前身（讲义）就是这样“泡”制出来的。当时有五十余万字，我也有了另一个收获：五笔字打得很快。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当年南京大学刚刚设立经济学博士点时，导师们即刻鼓励我去读，我却说“等我把教材(注：指《国际结算》)写好，才有时间备考呢”，谁知这一下竟耽误了好几年。现在看来如果早几年读的话，我后来的博士论文所关注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或许要晚好几年才能从欧美传入我国学界呢，当然也就不见得会有后来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了。现在，空间经济学产业集聚理论用来培养博硕士生，国际结算教材用来培养本科生。

教师节曾收到中大管院一位毕业生的邮件，他毕业后被录用为招商银行总行的管理培训生，信中写道，“梁老师，虽然您可能不记得我，但在离开学校的第一个教师节里，我最想感谢的老师是您，感谢您给我上了国际结算这门课，这门课是到目前为止我工作上最能直接应用上的，因而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一门课。”

我想，如果哪一天，我对新鲜事物没有了激情和热情，不再单纯地向往和追求，对学习新东西有畏难情绪，对挑战新事物有恐慌心理，那就真是衰老了，心已经不再年轻了。

有一次，我爬上河南云台山顶峰极目远眺，大自然景观深深地震撼着我：天地间，群山巍然屹立，生生不息；人类世世代代，古往今来。但，太阳永远是那个太阳，月亮总还是那个月亮。一个人的生命，就像那重峦叠嶂郁郁葱葱森林中的一片叶，只不过是那一片叶……叶生叶长，叶叶归根……，但叶绿，使叠翠流碧；叶黄，使层林尽染。尽管一个自然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我希望为社会的更加美好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我也将这一份感悟写进了学术著作《分工、集聚与增长》的后记里。

弗莱的一段教学箴言，及其它

●在教学中，需要用“反语”，也需要用“禅宗”，以此来做“称职的教师”。两者都意味着……

文/中文系 王敦

“教师从根本上说，并非是教无知者的有知者，这一点至少早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就确认了。教师的任务是使学生对所学习的课题进行再创造，而达到这一目的的策略则是让学生认识到他实际上已经知道了什么，其中包括破除他们头脑中的种种束缚，这些束缚妨碍了他们认识自己已知的知识。因此，在教学中提出问题最多的应该是教师而不是学生。

在我所写的书里就体现了这种教学特点，并因此引起了读者的某些反感，而反感的产生往往是出于对教师的笃信。就我来说，我之所以这么做却是出自一种有意回避的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又主要是由于我没有舍弃自己所具有的运用反语的特质。自苏格拉底以来，所有的教师都认为运用反语是教师的一种很重要的素质。不过并非所有的回避都仅仅是出自这个目的，就连耶稣的道德故事也是含有谜语的寓言。在有些地区，例如禅宗佛教地区，教师往往拒绝回答问题，或是用一句似非而是的话把所有的问题扫到一旁，以此表明自己是一个称职的教师。

如果回答了某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结果就会把思想认识固定在所回答的问题的水平上。教师在传授知识时应该有所保留，这就意味着还会有更好更深入的问题，否则学生的思想将受到阻塞，难以前进。”

——选自弗莱《伟大的代码》中译本

古往今来，总有人赞同这种教学法，自然也总有人强烈反对。“读者的某些反感”——更确切说，包括某些读者的完全的反感——出自原则上的完全不认同(很深层很复杂)，另有些则是“某些反感”——出于对方法表述上的误解。(解说也是没用的。)当然，还会有些人如我，则不仅不反感，反而对弗莱的说法很酷爱。

在教学中，需要用“反语”，也需要用“禅宗”，以此来做“称职的教师”。两者都意味着设法邀请学生遭遇“更好更深入的问题”，破除“束缚”和“阻塞”。弗莱和我，都不是那种在教学中高举亮瞎众人眼睛的“指路明灯”的人，并认为那离智识的偶像崇拜和反动会道门已经不远了。是的，教学所导致的心头的刹那间敞亮，对每个人来说，都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向。教育不过是催化剂，让每个个体营造自己的私有智识财产——当然和别人获得的绝对不是同一款。

这种强调“自由”的教育，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必须都真正行使自由并把对方当作真的大活人去对待，不能把对方缩减为概念和标签。当学生期待自由式教育结果时，最好意识到：不要用自己头脑中关于开明、自由的 18 岁单纯想像来评判教师——否则，眼睛所追逐的往往是中国式的关于开明的作秀，而不是真正的自由教育的实惠。当一个学生满脑子“死亡诗社”或“放牛班的春天”或对知识偶像的渴望而进入大学时，他/她既可能是真聪明，也可能是真傻子——区别在于是否给自己搭了个新框框，不管它与高中的那个被动的框框是多么不同。框框终究是框框。也就是说，一方面，专制的课堂会阻碍学生的自由；同样，专制的学生也无法真正懂得自由的课堂到底是什么样子。姿态上的新潮自由，固然让不动脑筋的人都能轻易辨认出姿态上的新意，然而如同僵化的模式一样，同属于“自愿专制”的共谋和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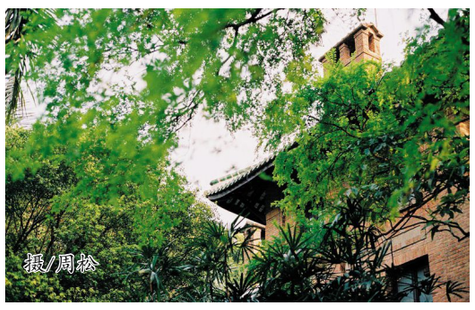
“在教学中提出问题最多的应该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这也并无压制学生提问的意思。它意味着学生在积极提问时，教师更不能懒惰，教师更需要成规模地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引领思考。这种双方都要出力、缺一不可的动态，很珍贵、很微妙。

我特别爱引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前会长、耶鲁大学名师梅纳德·马克（Maynard Mack，1909-2001)74 岁时，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的专题演讲“毕生的学术追求”(A Life of Learning,1983)，这里面就传达出了这种珍贵的微妙的动态。

他说，“在(我)毕生的学术生涯中——至少在体制化学术生涯中——是本科生扮演了那个陌生人(艾略特诗剧《岩石》里的人物)的角色。是他/她直言不讳地发问：你教的这个东西到底好在哪儿？或者，为什么国王没有穿衣服？为什么那些人装作没看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本科生的廉价恭维——机会和鼓励的均等并不意味着收获的均等……你看，老师的谦卑并不意味着学生的轻松。所以他又说：“我们最多不过是催化剂而已。我们如果方法得当，有些时候可以驱散(学生)视野里的迷雾。但是，我们做不到(替学生)安排其视野。它来自其它什么地方——通过文本，也许还经由学生的 DNA，也许还经由了其它我们迄今知之甚少的神秘之处。”

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说有了“西南联大”的老师，学生也就自动升级换代为西南联大的学生了；反之亦然。更糟糕的是，装西南联大就更不应该了。

诗意地栖居



●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文/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王竹立

在创新思维课上，我常常会让学生们用思维导图进行发散联想创作诗歌，大部分同学对此很感兴趣，都能顺利完成作品。有同学说：在王老师课上，我们都变成了诗人。但也有个别同学不以为然，认为作诗这东西太文艺，用处不大，其实这是一种天大的误解。

生活中常常有人认为文艺没什么用，既不能拿来当饭吃，也很难赚钱，文艺成了矫揉造作和不靠谱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短见与偏见。人没有物质不行，但只有物质也不行；没有科学不行，只有科学也不行。没有文学艺术、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也可以活着，但活得和动物没有区别。文艺不仅能丰富我们的心灵，还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和创造力，让僵硬的思维变得柔软，激发我们的创新思维。不懂得这一点，枉为一世人！

如果有人问我，热爱文学艺术诗歌绘画的人，和只喜欢权力金钱房子车子的人有何不同？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看到的世界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看到的世界是彩色的，后者看到的世界是单色的；前者可以进入宇宙的多层空间，后者只能进入一层空间。如果他们都活到八十岁，前者的人生体验将是后者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倍。

很多搞自然科学的人喜欢用还原论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和我们人类自身。在他们看来，人类和其他动物没什么两样，和机器没什么两样，人不过是肉做的机器罢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一定有不同于机器的地方，世界一定有我们人类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人不仅有动物性，还有神性。我更愿意相信或者说更喜欢后一种观点。荷尔德林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
仰天而问：难道我
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
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
来度测自己。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湛若青天？
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真想证明，
就连璀璨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
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

让我们活得更有诗意，更有创造性一点吧！除了相信人的勤劳和学习能力之外，我还相信智慧与洞察力。